

毛泽东首题“为人民服务” 为啥是给《大公报》?

《大公报》报道红军不称“匪”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张季鸾主笔的《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恪守新闻“四不主义”的张季鸾，不畏惧禁令，毅然派记者到红区采访，在《大公报》公开称“红军”，对“剿匪”一词打上引号，第一个把共产党作为客观的政治力量放在舆论舞台。

红军开始长征后，经张季鸾首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范长江历时10个月，全程1.2万余里，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宁、内蒙古等广大地区。他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写出《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陕北共勉刘志丹》等30余篇通讯报道。其时，张季鸾对范长江写的洋洋数千言战地通讯，仅要求四个字：“议论全删。”当时，在人迹罕至的西北蛮荒之地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几乎无人知晓。范长江写的战地通讯由《大公报》连载，此举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

1937年2月15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范长江的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正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张季鸾派记者采访毛泽东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季鸾积极主张联合抗战，不仅对中共的报道升级，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最新战况，而且派记者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

1937年12月，主持汉口版《大公报》的张季鸾，特派记者陆诒，到延安采访毛泽东。

毛泽东见到张季鸾派来的大公报记者陆诒，热情地迎上前握手，并亲自倒了一杯茶，还在另外两只茶杯里倒了本地的白干酒，边喝茶边呷酒，高兴地回答陆诒的提问。

《大公报》在12月20日刊载寄自延安的“陕北通讯”《毛泽东谈抗战前途》。这篇通讯写道：“延安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地区，一切的人，都为了抗战而紧张地工作着，毛氏的紧张与忙碌，当然更不能例外。他最近仍未改深夜办公，有时甚至到午夜工作，早晨迟起的作风。在上

众所周知，“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但随着岁月流逝，已很少有人知道这著名的五个大字，最早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期间给《大公报》的。

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何对《大公报》如此另眼相看?



张季鸾

午11时，记者邀约往访，那是他一天中比较最有暇的时间。”

在延安，陆诒还采访了彭德怀、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中共领导人，写了《延安进行曲》等通讯。

最早主张国共和谈

1940年，因为王芸生听一面之词在《大公报》重庆版刊登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引起中共误会。

正在养病的张季鸾，出面补救，在《大公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来信，还发表了长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

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思维，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

张季鸾此举，消除了国内外社会各界对中共与八路军的误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的信和《大公报》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张季鸾刊发了社评，不仅通篇不见“叛军”、“叛变”等污蔑性词语，而且为中共开脱，最后还请求宽大处理叶挺。

毛泽东题“为人民服务”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共两党开启重庆谈判，《大公报》最早得知这一惊人消息，早已有所准备，除像其他各报一样刊登新闻稿和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电报全文外，还在当天发了充满激情的社评，对和平谈判给予很高的评价。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大公报》派出记者专门到机场进行了现场采访。次日不仅在要闻版头条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喜悦之情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热烈期盼与欢迎毛泽东来渝进行国共谈判，真心诚意地希望战后中国能够实现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避免内战和分裂。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在繁忙的谈判之余，数次会见《大公报》记者和编辑，可见对故人创办的《大公报》之看重。毛泽东到达重庆一周左右，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当有人将《大公报》当时的总编王芸生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紧紧握着王芸生的手，并说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9月5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到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探望采访毛泽东。健谈的毛泽东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长达三小时，还特意留王芸生吃晚饭，由周恩来与王若飞作陪。

9月20日，《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宴请中共代表团一行，毛泽东携周恩来等欣然应邀出席。当时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非常贸然向毛泽东建议：“共产党能否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面对这一非常敏感话题，没有回避，而是幽默答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宴会结束时，依然兴致勃勃的毛泽东，应众人之邀，现场泼墨挥毫，为《大公报》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对张季鸾主笔《大公报》15年间，坚持“四不”精神，把中共和国民党平等看待，不称红军为“共匪”，多次派记者采访报道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八路军，促成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并夺取抗战胜利立下的功勋的认可。

(据《人民政协报》文/李满星)

史海溯源

“蛛丝马迹”的“马”是什么马

“蛛丝马迹”是一个常用成语，但“马”字该作何解释，似乎并未达成共识。多数人认为“马”就是马牛羊的“马”，所谓“马迹”就是“马蹄痕迹”。《中国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均持这一看法。连《汉语大词典》也将“蛛丝马迹”释为“蜘蛛的细丝，马蹄的痕迹。比喻隐约可寻的线索和依稀可辨的痕迹”。“蛛丝”确实细微不易被发现，可是马呢？马可是庞然大物，它留下的蹄痕相对而言要明显得多，称不上“隐约、依稀”，很难和“蛛丝”相提并论。

也有人持“蚂蚁说”。他们甚至把“蛛丝马迹”写成“蛛丝蚁迹”。一个蜘蛛，一个蚂蚁，似乎门当户对。但我们都知，蚂蚁一般很少会留下痕迹，而且蚂蚁在古代通称为“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严格说来，“蚂”只是个附着语素，单独一个“蚂”字

是不成词的。

那么，“蛛丝马迹”的“马”究竟是什么“马”呢？笔者认为应该是一种叫灶马的昆虫。

灶马的学名叫“突灶螽”，属于直翅目蟋蟀科。此昆虫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到，常出没于灶台与杂物堆的缝隙间，以剩菜、植物及小型昆虫为食。它爬过的地方通常会留下一条不太明显的痕迹，即我们说的“马迹”。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虫篇》记载：“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由此看来，“灶马”是可以简称为“马”的。“蜘蛛”和“灶马”体形相近，同为昆虫，两者并举是合适的。

“蛛丝马迹”最早出自清王家贵《别雅序》：“大开通同假借之门，泛滥浩博，几疑天下无字不可通用，而实则蛛丝马迹。原原本本，具在古书。”亦可写作“蛛丝虫迹”“蛛丝鼠迹”。清人夏敬渠《野史曝言》七十九回：

“蛛丝虫迹，屋漏蝙蝠，不即不离，有意无意，其妙如何。”又九十三回：“七绝一诗，拖起婚姻，有蛛丝鼠迹之妙。”此处的“虫迹”正是“马”是灶马的一个佐证。

既然灶马是一种昆虫，那为什么不叫“灶虫”呢？这和“马”的引申意义相关。《说文》：“蝠，马蝠也。”段玉裁注：“凡言马者谓大，马蝠者，蝠之大者也。”又桂馥《札朴》卷九：“马蚁，蚁蜂，皆蚁之大者。”人们称其为“灶马”，可能是它在人们所常见的昆虫里算比较大的，“状如促织，稍大”。

此外，还可能与人们对于丰衣足食的企盼心理有关。“灶马”相传是灶王爷的坐骑，灶台上经常有灶马的痕迹，说明灶王爷经常光临，自然预示着食无忧。

可见，事物名称往往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蛛丝马迹”的“马”解释为马牛羊的“马”，当然也可说通，但远不如释为灶马合理。(据《沈阳晚报》文/钱惠敏)

逸闻趣事

画贩敲诈少帅 碰壁而归

张学良不仅是军人，且酷爱传统艺术，对于中国古画尤其。1929年，东北易帜，少帅张学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那时他已被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全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至少从表面形式上而言，其在全国军界的地位仅在蒋介石一人之下。因为他喜欢古代字画，所以即便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张学良也要换上便服，在副官、秘书等陪同下去夫子庙几家文物字画店选购古画，以携回沈阳收藏。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有一次张学良去北平，特地拜访了名画家齐白石，一见面，他拉着齐白石的手说：“有幸识大师，我太高兴了，我小时上学就爱美术，但我无才，画笔下不出成就，可是爱画已成瘾了，日积月累，家里也收藏了许多名家作品。其中有您老家的几幅大作在内”。齐白石一听，自是十分高兴，交谈甚为投机。齐白石的画室是不轻易让人参观的，这一回他破例亲自带张学良来到挂满了画作，充满了独特的艺术情趣的画室，一边观赏，一边给客人解说。经过几次交往，齐白石十分欣赏张学良对国画的鉴赏能力。自此以后，两人来往频繁，成了朋友。

张学良喜欢古画之事，很快就被书画界传遍了。有一天，一个商人打扮成画家，去铁狮子胡同张公馆求见张学良，说是来献宝。张学良一见来人就问：“你献什么宝？”那位“画家”指着带来的一大纸卷说：“康熙皇帝题写的《天下第一画》的国宝”。张学良一听，精神振奋，连声自语：“国宝，国宝。”原来那是一幅宋代名画家李公麟所作《寒林牧马图》，为八尺设色绢本，装裱精致，此画看上去古意盎然，气韵生动。画上有元明清以来，包括乾隆、道光等皇帝的十多位名人名画家钤上的印章和题款。张学良凝神观赏之下，似乎爱不释手。略沉吟一会说道：“先生，你把国宝献给我，我不敢当，你卖给我好了，要多少钱呢？”那“画家”一听，暗自高兴，心想有门，遂摊开两个手掌说：“在下也不敢向少帅多要，十万美金即可也。”张学良一听，哈哈笑了。他已经识破这位画家想借献“国宝”发大财的用心，也看出此幅“国宝”级古画为有些艺术水平的仿作。心中顿生反感，便语带讽刺地说：“谢谢先生让我开了眼界，我张学良买不起，请你再找有钱的主儿去买吧！”那“画家”神色变了，甚是尴尬，收起国宝级画卷，很没趣地离开……后来，张学良再与齐白石见面，谈起此事，齐白石捋须笑道：“那个画贩子胆子真大，竹杠敲到将军头上上了！”

(据《文史天地》文/刘亦实)

图说历史

被遗忘的发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在西方世界，新的发明、创造和思想便趁势蓬勃生长。测谎仪、交通信号灯、复印机、青霉素、喷气发动机、直升机、泡茶袋、胶带、圆珠笔、泡泡糖……这些那个年代的产物，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宝贝。不过，在涌动的大潮中，更多的发明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一些图片，记录着往日那些令人惊叹的奇思妙想。上图为一个轮子的摩托车，最大时速150千米(意大利，1931)。(据《羊城晚报》)